

纪念黄润华先生

一生缘 一世情——深切怀念挚友黄润华先生

□ 史金波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听到黄润华先生离世的消息，十分悲痛！我们二人从年轻时相识，已有半个世纪的学术交往，虽不在一个单位，但关系过从甚密，已成相知相交的挚友。回忆与黄先生交往的情景，历历在目，音容笑貌，宛如昨日。黄先生待人以诚的品质，对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对业务精益求精的追求，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特殊时期的特殊接待

50 多年前的 1972 年，我所在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从“干校”返京。当时还在“运动”之中，明令禁止搞业务。在其后“运动”稍松之际，我想利用当时的空闲时机，开始搜集西夏资料并做研究工作。国内西夏文资料主要藏于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那时到北京图书馆看书需要有参加“批林批孔”介绍信。我找本所“军宣队”开了参加“批林批孔”的介绍信，到文津街北京图书馆办理看书手续。顺利入馆后，我来到收藏西夏文文献的善本部民族语文组，接待我的便是黄润华同志。经交谈我才知道，黄润华也是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语文系毕业，与我是同系校友。我提出要看西夏文文献，黄润华很了解民族文字古籍的重要性，为我打开方便之门。

那时北京图书馆已将西夏文文献归入善本书籍，阅览很严格，我一人单独在一小房间里阅览，阅览文献时轻拿轻放，记录只能使用铅笔，不能用钢笔。记得黄润华同志第一次取西夏文文献时，我翘首期待。只见他提来一个有泛黄包皮的包袱，打开包袱皮后，见到多册黄色牛皮纸包皮的书册，再打开后，眼前一亮，终于见到了期待已久的西夏文古籍。这些装帧考究、古色古香的民族文化遗存，散发着古代文化的魅力，使我领略神奇，感到震撼。



图 1 层层包裹的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古籍



图 2 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古籍

在近 3 个月的时间里，我每天早晨从西郊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内）赶往北京图书馆，“潜伏”于斗室内，徜徉于西夏文古书的氤氲之中，不失时机地整理这批珍贵古籍。黄润华先生不断来照看我，提供饮水。我将馆藏 120 余部西夏文佛教文献全部阅览登录，做了

卡片，抄录了部分资料，最后还将我最看重的有关西夏佛教史的重要部分，即一些西夏文佛经的序、跋、发愿文、题款等，通过黄润华先生申请拍摄成23张照片。这些文献记载了西夏承续中原王朝翻译佛经的史实，西夏国师白法信、白智光等从西夏景宗朝至崇宗朝，将汉文大藏经译成3000多卷西夏文佛经。这些重要资料为国内外所仅有。其中西夏文《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前的西夏译经图，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幅译经图，上有西夏文标明主译者、助译者和亲临译场的皇帝、皇太后的名字。1979年我以此珍贵资料撰写了《〈西夏译经图解〉》，发表在北京图书馆出版的《文献》第一辑（创刊号）上。此后又发表了《〈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译证》《〈金光明最胜王经〉序跋考》等论文，构架出西夏佛教史主体框架，为此后我撰写《西夏佛教史略》一书打下了基础。



图3 西夏文《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前的西夏译经图

黄润华先生在特殊时代热情接待我这个不合时宜的不速之客，需要有相当的业务眼光和担当责任的勇气。

大概这次接待是20世纪20年代末期周叔迦先生、王静如先生整理这批西夏文文献以来40多年来又一次有人光顾这批珍贵古籍。而由于这次西夏文文献的重新整理和研介，使馆藏西夏文文献再次令人瞩目，其中黄润华先生的热情接待功不可没，同时也开启了我们之间的交往。

1981年我再次联系黄先生，想更仔细地重新整理藏于北京图书馆的西夏文文献。黄先生也认为馆里也应该编一套正规西夏文文献目录。黄先生向馆向领导汇报后，同意由我进行系统整理。这次是合作性质的工作，黄先生向部里要了一间办公室，打扫得干干净净，把民族语文组一套不全的《大正藏》搬进来供我查找。从2月中旬以后，我只要有空就去北京图书馆整理编目。馆藏西夏文佛经分为8包，共113卷，另有残页两张，卷轴一个。此次整理，先把现藏文献与周叔迦目录作核对，发现有所增减。整理中发现有些佛经页面残损脱落，前后颠倒，次序紊乱，而经文页面又没有页码，需要将经文译为汉文，再对照汉文佛经，才能排定顺序。此次整理核对出西夏文所缺部分的起止字句，并估算出所缺页数，对周叔迦目录中的缺误作了补正。此次整理工作结束后，我和黄先生合作写了一篇《北京图书馆藏西夏文佛经整理记》，发表在1985年第4期的《文献》杂志上，为这次整理作了一个总结。

2001—2002年,我又在此目录基础上与国家图书馆的王菡、全桂花、林世田等同志再次对馆藏西夏文文献进行整理,对文献细部进行考察、核对,包括书耳处的书名简称、书口等处的刻工姓名等都一一作了登录,成为一个详尽的目录,刊登在《国家图书馆学刊增刊》西夏研究专号上。

二、为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的成立和发展做出贡献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的热烈气氛中,学术界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一些学术领域在老专家的带领下酝酿成立群众性学术组织。当时全国尚没有一个实体单位从事中国民族古文字及其文献的综合教学和研究,各地各文种专家处于分散研究状态。一些文种的研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一些年轻的学者崭露头角,需要有一个总揽全部民族古文字研究的学术组织,以开展国内外交流。1979年在天津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包括季羨林先生在内的20多位老专家发表了一份加强民族古文字及其文献研究、成立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的倡议书,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翁独健先生是发表倡议书的老专家之一,当时是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副所长。后来在民族研究所召开了民族古文字研究的座谈会,一些老专家和部分中青年专家与会,研究筹备成立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事宜。黄润华先生也是当时中青年骨干之一。会议决定成立研究会的筹备工作由民族研究所承担,负责联系工作的是照纳斯图先生和我。当时的中青年专家还有耿世民、王尧、张公瑾、黄振华、道布、黄润华、于宝林等。经过一段时间筹备,于1980年8月在承德市召开了民族古文字学术研讨会,并成立了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老专家傅懋勳先生被推选为会长,我任秘书长,黄润华先生作为会议筹备班子成员,根据分工做了大量组织工作,会上被推举为副秘书长。



图4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成立大会合影,二排左五为黄润华先生

会后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筹备,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和国家民委文化司在民族文化宫举办了“中国民族古文字展览”。黄润华先生积极参加筹备,主要操持展品的选择和联系各部门供展文献。北京图书馆是民族文字古籍存藏大户,保存的民族古籍文种多,数量大,质量好,当为此次展览的重要支撑部门。黄润华先生既是北京图书馆民族语文组的负责人,又是此次展览的筹备骨干,一身二任的身份使他忙碌不已。北京图书馆借展了多种精彩的民族文字古籍原件,为展览增色很多。黄先生对此次展览筹划奔忙,做出了突出贡献。

展览用近千件展品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少数民族古文字的概况,展示了丰富的民族古文字文献,宣传了进行此学科研究的重要意义。展览会展出了佉卢字、焉耆一龟兹文、于阗文、

突厥文、回鹘文、察合台文、西夏文、藏文、傣文、彝文、东巴文、哥巴文、契丹文（大小字）、女真文、回鹘式蒙古文、八思巴文、满文等近二十种文字的近千件展品，展品中不少是第一次公开展出的重要文物和文献。为期一个月的展览，参观的观众有12000余人次。中央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对这次展览很重视，乌兰夫、赛福鼎、阿沛·阿旺晋美、万里、邓力群等10多位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参观了展览。国外人士对展览表现了极大的兴趣，英、法、美、意、西德、日、荷、加拿大、比利时、奥、泰、捷、澳、爱尔兰等20多个国家的外宾和联合国的官员相继前来参观。这次中国民族古文字文献的成功展出，使国内外真切地了解到中国民族古文字文献的丰富多彩和巨大价值，极大地推动了此后的民族古文字研究。黄润华先生为此付出了辛劳，值得怀念。



图5 中国民族古文字展览期间国家领导人乌兰夫同志参观展览，与部分会务人员合影，第二排左三为乌兰夫同志，第一排右一为黄润华先生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成立时，将一些古文字研究专家聘为荣誉会员，其中包括北京师范大学的启功先生。启功先生是著名的书法家，会后我们为研究会成立求启功先生的墨宝。得知启先生写得后，我与黄润华先生到启功先生家里拜访取墨宝。启先生写了一首七律，赠给学会。我和黄先生十分高兴，感谢启先生的支持。记得当时我们和多识而幽默的启先生谈话，先生谈笑风生，令人印象深刻。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成立后，积极开展民族古文字研究和组织工作，在不同的阶段提出推动民族古文字研究的研讨重点、出版古文字研究著述，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使民族古文字研究呈现出全面、系统性发展良好态势。至今研究会已经走过40多年的历程，在加强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队伍的组织建设、促进会员之间的学术交流、编辑出版研究成果和学术资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有力地推动了民族古文字及其文献的研究。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纂了《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第一次全面介绍了中国民族古文字及相关的300多种文献，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傅懋勳会长任主编，黄润华先生为编委之一，除参与总编之外，还专门负责难度比较大的多文种资料的编写和图片的收集，圆满地完成了编写任务。

黄润华先生后来担任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的副会长，经常参加领导班子会议，并出席了大部分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他在研究会中参与讨论工作，出谋划策，组织实施，勤勉踏实，贡献良多，令人赞叹。

三、积极参与、推动全国古籍保护工作

在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的组织和影响下,少数民族文字研究逐步展开,影响不断扩大,对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的整理、研究、出版呼声越来越高。这引起学术界和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当时国家民委的领导也关注此事,并多方征询意见。1983年6月国家民委在北京卧佛寺召开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座谈会,国家民委副主任伍精华同志主持会议,副主任黄光学、洛布桑,教育部长周林出席讲话,时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同志也出席讲话,全国各地代表参会,我和黄润华先生也受邀出席会议。



图6 1983年6月9日中国民族古籍文献座谈会合影,四排左六为黄润华先生

此前在1981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重要文件,同年12月,国务院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李一氓任组长,由此中国的古籍整理工作出现了繁荣局面。1982年李一氓同志在《人民日报》撰文,论述中国古籍的重要性。时任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副秘书长黄润华致信李一氓同志,说明民族古籍的重要性。后来,李一氓同志在《人民日报》再次撰文谈古籍整理工作时,文中有一段专门论述了民族古籍,明确指出:“民族古籍是我国古籍的一部分”。后来知道李一氓同志对黄润华的这封来信很重视,特地批转到国家民委。当时国家民委的领导也关注此事,并多方征询意见。可见黄润华先生对民族文字古籍在中华民族文化中的地位的认识深刻,并显示出他对工作的高度责任心,为民族文字古籍的整理、出版做出了突出贡献。

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座谈会后,1984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民委关于抢救、整理少数民族古籍的请示》,少数民族古籍保护、抢救、搜集、整理、翻译、出版、研究工作正式展开。黄先生受邀参加了此项重要工作,在民族文字古籍整理、出版方面做出了新的贡献。

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下达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保护工作也因此进入了新的阶段。在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是古籍保护工作的重点之一。在国务院领导下,由10个部委组成全国古籍保护部际联席会议,以文化部牵头开

展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建立了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委员会和专家委员会，并成立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黄润华先生被聘为专家委员会委员。

为保证全国古籍普查工作的顺利开展，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和各省级分中心成立普查队伍，组织培训工作。过去少数民族地区古籍鉴定和保护工作相对滞后，古籍工作者十分缺乏。为配合这次古籍大普查，全国古籍保护中心在多地举办了多次少数民族古籍普查培训班和民族文字古籍鉴定与保护培训班。2008年10月在北京举办了第一期民族语文古籍鉴定与保护研修班，由我和黄先生授课，黄先生重点讲北方民族文字古籍，我重点讲西夏和南方民族文字古籍。课后学员提出不少问题，我和黄先生分别回答，学习效果很好。



图7 2008年10月第一期民族语文古籍鉴定与保护研修班合影，前排右五为黄润华先生

当时还有一项重要工作是评审珍贵古籍，出台《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珍贵古籍名录的评审分为5个组，其中有“民族语文文献组”，专门负责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评审。我和黄润华先生被指定为组长和副组长，负责主持“民族语文文献组”评审工作，委员包括十多位专家。由于黄先生对民族文字古籍的谙熟，往往由我们二人共同主持评审会议。自2008年至2019年，先后评审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至今以国务院名义发布了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在已出版的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都有少数民族文字珍贵古籍。

黄先生参加了所有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评审工作，自始至终精神饱满，兢兢业业。黄先生对民族文字古籍评审标准把握准确，持论允当，为大家所称道。



图8 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评审会民族文字古籍组合影，前排右一为黄润华先生

在进行《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评审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字古籍评审组根据工作需要，制定了《民族文字珍贵古籍入选标准》，以便遴选珍贵古籍。这实际上是初步制定了民族古籍一二级的标准，国家级珍贵古籍是从符合这个标准的图书中优中选优。2008年12月在

参考汉文古籍定级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多文种、多类型的特点,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定级标准。

后来文化部与国家民委确定由中国民族图书馆牵头制定“中国少数民族古籍定级标准”。2009年4月在民族文化宫召开会议,起草“中国少数民族古籍定级标准”,起草人主要还是参与《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评审的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组的评审委员,其中有黄先生。

经过多次反复讨论、修改,确定标准并上报。2018年9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共同提出,由全国图书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389)归口,由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民族文化宫(中国民族图书馆)主要起草的国家标准《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定级》(GB/T 36748—2018)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2019年4月1日实施。这一重要标准的公布对指导我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保护工作更加科学化、法制化发展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黄润华先生为此也付出了心血。



图9 2009年9月中国少数民族古籍定级标准论证会参与起草人员合影
前排左三为黄润华先生

2010年5月下旬,四川省民委古籍办邀请我和黄润华先生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和成都市对当地的古籍保护工作进行考察、调研。我和黄先生一起到凉山州主管古籍工作的州语言工作委员会、收藏彝文古籍较为集中的凉山州彝族奴隶制博物馆、美姑县语委、昭觉县语委以及西南民族大学民族文献中心进行调研。调研中我们看到了不少彝文的珍贵文献,如写于羊皮上、刻于牛骨上的彝文文献,以及时代较早的纸质文献,同时也看到很多破损严重、亟待修复、保护的文献。考察时召开了多次座谈会,在座谈会上我和黄先生介绍了全国古籍保护工作的意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评审和全国重点古籍保护单位评审情况,并结合彝文文献重点介绍了少数民族文字珍贵古籍入选标准和申报注意事项。



图10 2010年史金波、黄润华到四川省凉山州考察彝文古籍，左为黄润华先生

四、合作出版民族文字古籍著作

进入21世纪后，任继愈先生主持筹划编纂一套《中国版本文化丛书》，共分宋本、元本、明本、清刻本、少数民族古籍版本、坊刻本、家刻本、插图本、新文学版本等10册，全书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其中的《少数民族古籍版本——民族文字古籍》就由黄先生和我承担。这一任务对我们来说，十分艰巨。首先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字种类繁多，体系各异，可以说没有哪一位专家能通晓所有中国各民族文字。因此，除去我们熟悉的民族文字古籍外，其他文种的古籍只能在参考有关同行、同事的著作的基础上，再做一些版本上的考察和研究。其次，少数民族文字及其文献的介绍和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但专门从少数民族古籍版本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还是一个新的尝试。少数民族古籍分散在各地，分别存于各地图书馆、博物馆、大学、研究单位，甚至有的保存在私人手中，还有不少流失海外。我们虽不可能亲见分散在各地的所有民族古籍，但我们尽可能多地考察各种民族古籍。好在国家图书馆存有多种民族文字古籍，黄润华先生了解得很深入，有的民族古籍还是黄润华先生在少数民族地区搜集入馆的。此书在2002年作为版本丛书之一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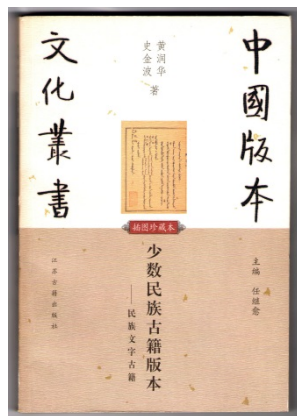


图11 《少数民族古籍版本——民族文字古籍》

2001年5月我到北京大学参加一个有关印刷出版的会议，在会上我发言时主要讲了少数民族文字的印刷出版问题。与会的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主持工作的副所长余敏同志在会后找我谈话，说他们正在筹划编纂《中国出版通史》，按历史时期分卷编写，希望我能参加，并承担其中的民族文字古籍出版的编写任务。我考虑后，答应了他的要求，并提出希望与国家图书馆的黄润华先生合作共同承担此项任务。会后我与黄先生沟通，黄先生欣然同意。

后成立了《中国出版通史》编委会，我和黄润华先生都被聘为编委。经过多次讨论，全书体例按历史时期分卷编写，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出版分置于各卷之末。

按此体例编写,给我们带来了挑战。因为不少少数民族文献的形成和发展往往缺乏准确的时间记载,一些少数民族文献本身也没有明显的时代标志。同时我们也想到,按照中国历史发展的顺序展示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出版的风貌,可以统揽各历史时期各种少数民族文字及其文献的流行使用情况,能比较清楚地了解少数民族文字书籍发展的历史脉络,可以此透视当时少数民族文化的时代特征,因此我们接受了这一既有难度、又有特殊意义的任务。

我和黄先生尽力依据相关文献的记载,对各文种的主要文献进行断代分析,时代不明确的文献根据文献自身时代特征及相关资料,来确立文献的时代。最后仍难以考订时代的文献,只能留待以后再进一步探讨。

《中国出版通史》于2008年出版,共分九卷,其中魏晋南北朝卷、隋唐卷、宋辽西夏金卷、元代卷、明代卷、清代卷(上)、民国卷都有少数民族文字书籍的出版一章。这样就对少数民族文字的出版历史做了系统的梳理和研究,比较全面地反映全国各地区、多民族、多文种的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的重要内容、特点和贡献,这不仅具有重要的注重学术、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还体现出贯彻、落实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政策,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深意。在2009年召开的《中国出版通史》发布会上,在总结发言中指出此书编纂的特点之一是,具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整体观点。全面反映各少数民族出版在中国出版史中的重要作用和伟大贡献及港澳台地区出版事业的发展情况,从而使《中国出版通史》成为一部完整的‘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通史’。”尽管在各相关卷的作者栏中都没有标识出我和黄先生的名字,我们仍然为在这部全国性的出版通史中补充了少数民族书籍的出版而感到劳有所值。



图12 《中国出版通史》

后来有的专家希望我们把《中国出版通史》中各卷中所写有关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出版的内容,汇集成一部专著,更有特色,更有价值。我们二人又在此基础上认真钻研,完善体系,增加内容,提炼观点,形成一部贯通中国各历史时代、比较全面地展示中国民族古文字文献的著作。在论述少数民族文献时,我们除介绍、探讨文献的内容和价值外,还着意关

注文献的作者、文献形成的背景和文献形成的过程。我们认为这些内容不仅对了解具体文献的产生及其价值有所裨益,对了解当时的民族文化趣向、民族文化的社会需求以及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影响也会有参考价值。当然这又给我们增加了难度。期间我们请教了很多民族古文字专家,完稿后又请专家们审阅,提出意见。最后由中华书局于 2008 年出版,书名采用了黄先生的意见,定为《中国历代民族古文字文献探幽》。

此书出版后,有专家著文评论:“这本书以中国的历史脉络为横轴,以少数民族的文字文献为纵向的坐标点,清晰地梳理了我国古代各个时期少数民族的文字文献的使用情况,是一部反映我国古代历代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专著,学术价值极高。……书中详实的资料,新颖的视角,清晰的结构,都让我获益匪浅,感触颇深。”

此后在开展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中,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的少数民族古籍普查培训班和民族文字古籍鉴定与保护培训班时,黄先生和我合作的《中国历代民族古文字文献探幽》成为学员学习的主要参考书。

201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我考虑应该对中国民族古文字及其文献研究做出回顾和总结。我想这个任务还需要我和老搭档黄润华先生合作完成。我和黄先生沟通后,他表示完全同意。我先起草文稿,后黄润华先生做了修改和重要补充。此文以《开拓创新,成就辉煌——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 70 年》为题发表在《民族语文》2020 年第 4 期。文章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来的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做了梳理和归纳,记叙了中国民族古文字研

究会的成立并开始建立学科体系,举办大型“中国民族古文字展览”,全面、深入开展中国民族古文字及其文献研究;概述了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建立,开展少数民族古籍普查,编纂《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促进民族古籍整理出版;回忆了近十多年来开展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列入全国普查范围,评审包括少数民族文字在内的《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出版《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启动西藏、新疆古籍保护专项工作,制定《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定级》标准,进一步推动民族文字古籍的保护和研究;列举了民族古文字研究大量创新成果,显示在国内外取得越来越多的话语权。最后希望进一步做好民族古籍普查,深入开展民族古籍的研究,夯实民族古籍的定级工作,为民族古文字及其文献“活起来”,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遗产、增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做出更大贡献。

此外,长期以来国外研究西夏文的专家,凡来中国,多要阅览国家图书馆珍藏的西夏文典籍。如日本的西田龙雄教授,俄罗斯的克恰诺夫、克平教授等来中国访问时,我都负责接待。他们提出参观国家图书馆文献时,由我开具介绍信与黄先生联系。黄先生则按馆藏规定,居中联系,依礼热情接待,往往事半功倍,国外专家都很满意。因西田龙雄教授除研究西夏文外,还研究《华夷译语》,与黄先生业务相通,也有了学术往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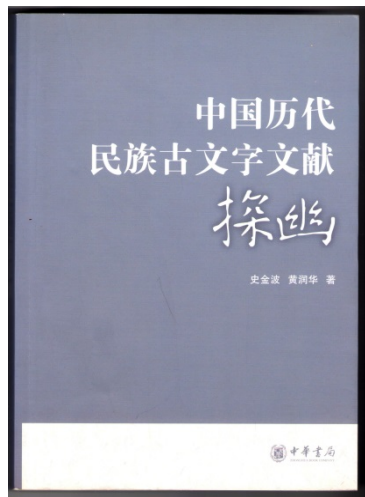


图 13 《中国历代民族文字文献探幽》



图 14 1989 年接待西田龙雄教授（左起：黄润华、孙宏开、西田龙雄、作者）

近几年因疫情的原因，不便晤面，我和黄先生不断以电话沟通。疫情稍缓，黄先生提出我什么时候到民族所时，两人见个面（民族所在中央民族大学院内，与黄先生家较近）。但后来总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今年 7 月 13 日我受邀到国家图书馆参加《中华医藏》首批图书发布仪式。我事先向联系我的庄秀芬同志说，我想与黄润华先生见面。会后由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的郭晶同志陪我到黄先生家拜访。我们一进门看到黄先生身体瘦弱，原来黄先生身染重病。尽管黄先生谈吐清楚，思维清晰，但已不似当年的风采。我向家属询问了病情，并请他多保重身体。还给他带去了我的一部近著。黄先生也送我不久前出版的一部沉甸甸的著作，即他和屈六生先生合著的《满文文献知见录》。回家后我翻看了这部书，感到内容丰富，对从事满文研究的专家无疑是一部最重要的工具书。10 天后我给黄先生发微信：近几天浏览您和屈六生先生主编的巨著《满文文献知见录》，内容全面，记录详尽，查找方便，对学界做出新的、重要贡献！黄先生回复：谢谢史先生的鼓励。没想到这竟是我们最后的诀别。8 月 15 日收到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通知，黄先生于 12 日去世。我虽然已知黄先生病重，但接到这一噩耗仍然悲痛万分！回忆与黄先生的一生交往，与先生在一起时的音容笑貌，不禁唏嘘。

黄先生自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国家图书馆工作，兢兢业业，心无旁骛。黄先生一生，聪慧善学，业务精益求精。他大学在中央民族学院学习维吾尔语，工作后又主动学习满语文。他与著名民族语文专家胡振华先生合作研究《高昌馆课》，成绩斐然。他参与汇集满文资料并从事研究，成果众多。他并非图书馆专业，自到国家图书馆工作后，恶补图书、版本专业知识，终成专家，后来担任善本部主任，足见其学识之深。

黄先生对工作认真负责。他无论是在本单位的善本部工作，在馆长办公室工作，还是业余在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工作，都能全力以赴，一丝不苟，不计个人得失。黄先生是一名共产党员，有 30 多年党龄。他严格要求自己，忠于事业，称得上“优秀”二字。

黄先生待人以诚。他为人和顺，既有原则，又虔诚热情，十分得体。我和黄先生以工作、业务相交，已成挚友，既能互相深切理解，密切合作，又平淡如水，纯洁无杂。黄先生十分尊重老专家，又关心年轻同志。我见他无论是在善本部，还是后来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和大家相处，十分和睦，大家对他也十分尊重。

黄先生离开了我们，回忆与黄先生的历史交往，音容宛在，记忆犹新。黄先生一生的成就和优秀品质，都值得我怀念和学习。

黄润华先生千古！